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二十一卷二期

2021年12月，61~103



## 劃界與跨界：探討代間教育流動 對音樂文化資本的影響

莊致嘉、游騰林

### 摘 要

本研究聚焦在作為一種異質性社會化經驗來源的教育流動及其與文化資本的關聯性探討。本研究使用2007年施測的「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做分析。研究的主要發現：一、臺灣社會透過音樂文化資本區辨出幾乎不消費、純食流行音樂、純食高雅音樂、雜食且偏好在本地音樂、不一致的雜食等五種集群。二、音樂文化資本的劃界不僅出現在純食與雜食群體之間，雜食和純食群體內部還有各自的異質性。三、家庭背景是形塑音樂文化資本的最主要社會化脈絡，但並非唯一，社會流動過程所添加的音樂文化資本成了秀異的關鍵，故文化再製模型弱假設獲得支持。四、向上流動者的雜食特質是來自跨界流動經驗轉化為「排拒」和「仿效」兩種主要的社會實踐行動，上層低度流動者的雜食則是「區辨仿效者」和「文化善意」的結果。

關鍵詞：文化資本、文化再製、社會流動、秀異、雜食

- 本文作者：莊致嘉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游騰林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
- 投稿日期：110年1月25日，修改日期：110年5月31日，接受刊登日期：110年6月15日
- DOI：10.53106/168020042021122102002

*Demarcation and Boundary Crossing: An Inquiry into the Effe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on Musical and Cultural Capital*

Chih-Chia Chu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eng-Lin Yu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ducational mobility as a source of heterogeneity in the socialization experience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cultural capital. This study utilizes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2007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he main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Five clusters were identified in Taiwanese society in terms of musical and cultural capital; (2) Although the demarc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is apparent between univorous and omnivorous groups, there is also heterogeneity within omnivorous and univorous groups; (3) Family background i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context that shapes musical and cultural capital, but is not the only one to do so. The musical and cultural capital added during social mobility has become critical to the distinction, providing weak support for a cultural reproduction model. (4) The omnivorous traits of persons who experienced upward mobility resulted from the two major social practices of “rejection” and “imitation,” which transformed the cross-boundary mobility experience, whereas the low mobility experienced by individuals with omnivorous traits in high social classes resulted from “distinction imitators” and “cultural goodwill.”

Keywords: cultural capital, cultural reproduction, social mobility, distinction, omnivorousness

## 壹、前言

長期以來，Bourdieu的文化再製觀點是解釋教育成就與階級不平等之間關係的重要視角，但有愈來愈多的經驗研究發現Bourdieu的再製論點並不適用於社會流動性高的地區（e.g. Aschaffenburg & Maas, 1997; Daenekindt & Roose, 2013a, 2013b; DiMiaggio, 1987; Lahire, 2008, 2011; Lamont, 1992）。Lamont（1992）發現Bourdieu的文化再製觀點較適合描繪一個同質性高、社會流動性低的社會。DiMiaggio（1987）更早注意到，隨著行動者在社會和地理空間的流動性增加，社會地位愈高者所掌握的文化資本內涵也隨之增廣。同樣關注社會流動對文化資本的影響，Lahire（2008, 2011）提出「文化的不一致性」（cultural dissonance）概念，認為異質的社會化經驗支配著當代社會中每一個人，使得跨越階級界線的文化資本特質不會僅是社會上層者獨有的，在任何社會位階者身上都明顯可見。Daenekindt與Roose（2013b）則以「文化變色龍」（cultural chameleons）描繪個人文化資本內涵的多變和彈性調整的適應能力。上述這些研究並不同意Bourdieu主張幼年時家庭教養所內化的慣習是文化再生產最關鍵的因素，他們認為社會流動所帶來的異質性社會化經驗對文化資本也有深刻的影響。然而，這些觀點的論辯隱含的是一個理論層次上的核心論辯未被釐清，即究竟是文化再製觀點強調的原初社會位置（social position of origin），抑或是社會流動論點的異質性社會化經驗對文化資本的影響占有主導地位（predominant effect）。

過去二、三十年間，臺灣有鮮明的社會流動，伴隨著個人社會化經驗的異質性增加，以及社會階級認同的界線變得模糊。這幾十年來，臺灣除了經歷產業調整和社會轉型之外（林宗弘，2009，2013，2015；林宗弘、胡克威，2011），教育擴張的結構性向上流動更是明顯易見（林宗弘，2009；張宜君、林宗弘，2015；陳寬政、劉正，2004；蘇國賢、喻維欣，2007）。但目前學界的研究成果並未能即時說明臺灣社會變遷已發生的階級變化現象

(林宗弘, 2009), 其中之一是至今仍沒有足夠的研究成果提供我們去瞭解社會流動脈絡下的文化資本內涵及其區辨的效力。有鑑於此, 本研究目的要檢視文化再製和社會流動模式的研究假設, 探討不同型態的代間教育流動是否有明顯差異的文化資本, 以瞭解文化資本作為一種社會區辨指標的有效性, 並填補學術研究提問與社會現象之間的落差。本研究以閱聽音樂的偏好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觀察, 其依據來自過去豐富的經驗研究支持。Peterson 與 Simkus (1992) 指出音樂品味是對文化資本概念的有效測量。Van Eijck (2000) 也贊同音樂是非常適合用來研究品味殊異的指標。Coulangeon (2005) 更指出音樂實踐 (musical practices) 是階級社會化 (class socialization) 的強勢指標。而且, 心理學研究發現音樂偏好即使隨著時間變化仍舊非常穩固 (Rentfrow & Gosling, 2003)。因此, 本研究先使用 K-medoids 分群法分析音樂文化資本所建構出具有區辨的群體, 再透過卡方檢定、多重對應分析和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探討代間教育流動與音樂文化資本的關係, 以回應文化再製的地位取得觀點和社會流動取徑的研究假設對於文化資本形構之解釋力。而選擇以教育流動作為分析社會流動的指標, 不僅是因為它能夠提供不同於家庭出身背景的社會化經驗來源, 更是預測文化資本概念最有力的指標 (莊致嘉、游騰林, 2016; DiMaggio & Ostrower, 1990)。所以, 本研究採用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檢視影響音樂文化資本的因素, 特別聚焦在代間教育流動對音樂文化資本的影響效果。相信本研究能夠提供我們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再深入瞭解臺灣社會各群體之間的象徵界線 (symbolic boundaries)。

## 貳、文獻回顧

目前, 國內文獻較少從社會流動的脈絡去瞭解個人的文化資本是否受到社會流動的影響。這對我們欲掌握社會流動脈絡下的階級象徵界線、文化階層的有效性, 以及文化資本作為社會區辨的原則造成阻礙。從 Sorokin

(1972) 開始，社會流動與不平等就一直是社會階層領域關注的焦點。許多研究探討教育擴張後的代間與代內教育流動對階級再製的衝擊（例如張宜君、林宗弘，2015；蔡淑鈴，2004；Lucas, 2001; Shavit, Arum, & Gamoran, 2007）。他們承襲Blau與Duncan（1967）地位取得模型和Lipset與Bendix（1959）以降對社會流動的核心關懷，視個人的家庭背景為一種社會化因素去思考教育轉銜過程中原初家庭背景的持續影響力。同樣的理論視角也廣泛被運用在分析家庭背景與文化資本的關係<sup>1</sup>，但關於社會流動的社會化經驗與文化資本的關聯性之討論則較為罕見。Chuang與Lin（2017）是國內近期少數從社會流動視角分析文化資本多樣性面向的經驗研究，具有參考價值。但有別於Chuang與Lin對文化資本內涵的思考，本研究將文化資本視為一個綜合各項特質的潛在變量。以下將討論社會化經驗對文化資本形構的影響，以及文化再製模式與社會流動模式的觀點及其所對應的研究假設。

## 一、社會化經驗與文化資本的關係

從文化再製觀點和社會流動模式的思考軸線，有兩種主要影響個體文化資本的社會化脈絡，即家庭內部的社會化和社會流動後的終點社會位置。依據社會流動觀點，經歷社會流動的個人至少面對兩種不同的社會化脈絡，一個是出身起源（origin），另一個是終點（destination）的社會位置，而且不同的社會化脈絡有其殊異的文化、慣習、偏好及參與活動的動機。例如，向上流動者是出身於以通俗性日常活動作為慣習，而最終置身於以高雅活動為日常慣習的社會環境，他們面對如Blau（1994: 41）所言的「社會流動使得個人身處於交錯壓力之中」（social mobility puts individuals under cross-pressure）。而經歷交錯壓力的人會產生出一種非穩固性的慣習（Bourdieu,

---

<sup>1</sup> 礙於篇幅有限，國內相關實證研究的回顧可詳閱莊致嘉與游騰林（2016）的文章。先前這些研究對於文化資本和教育成就之間的關係仍未達共識性的結論（Byun, Schofer, & Kim, 2012），但長期累積的研究成果是本研究重要的研究基礎。

2000: 160)、不自在感和情緒波動 (Friedman, 2014), 或是格格不入的感受 (Daenekindt & Roose, 2013b)。這些感受或非穩固性的慣習是經歷社會流動者試圖讓自己能夠適應新的社會環境所發展出的一種印象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 或心理學所謂的自我呈現 (self-presentation) (Daenekindt & Roose, 2013b)。而非穩固性慣習下的自我呈現會形構成某種特質的文化資本內涵。

「異質的社會化」概念可以再追溯到Merton (1968: 423) 在《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 (*Social Theory & Social Structure*) 提出的「角色集」 (role-set), 認為一個人因為占有某個特殊的社會地位而擁有整組角色關係且具有「社會學的兩難」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情境, 即Merton與Barber (1976: 6) 補充說明的「態度、信仰和行為上不一致的規範性期待」狀態。Merton (1968) 指出行動者在處理這些不一致的規範性期待時有許多種具體的機制, 其中之一是受到行動者參與角色關係的投入程度差異所影響。換言之, 行動者可以選擇忽略某些邊緣角色關係的規範性期待, 而特別傾向或偏好於某些在個人生命中更核心的角色關係。本研究進一步將Merton的論點運用在思考社會流動與文化資本的關聯性, 嘗試去指出某一個社會化脈絡對文化資本內涵可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例如出身起源或終點的社會化脈絡扮演主要的角色; 反之, 其他因素僅起微不足道的作用。

但假若在出身起源與終點的社會化之外的其他社會化脈絡也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則會外顯出Lahire (2008, 2011) 的「文化的不一致性」。所以, 音樂文化資本的不一致性可視為是多種社會化脈絡的規範性期待之相互妥協結果, 也是行動者經歷過的不同社會階層的日常生活慣習之綜合展現。如果一個社會的代間教育流動與文化資本之間的連結出現不一致的文化資本內涵, 意味文化價值的正當性 (legitimacy) 與違逆社會規範這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 行動者的品味也從單一轉變為多樣化。同時, Lahire的「不一致」觀點更進一步認為階級之間的區辨原則已轉變為個人特質殊異的文化實踐, 如性別、年齡等, 而非階級。這反映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 個體將隨著社會

流動而重塑社會區辨的屬性條件，也表示立基在文化再製模式的文化純食論點可能高估了原初家庭社會化力量的重要性。

「文化的不一致性」概念也不同于Peterson與Simkus（1992）強調雜食僅發生在上層階級的文化雜食邏輯。Peterson等人（Peterson & Kern, 1996; Peterson & Simkus, 1992）指出社會菁英階級在面對愈來愈多從底層向上流動成為上層者的挑戰時，菁英階級開始轉向對中下層文化資本內涵的掌握，但同時仍保有高雅文化資本，而出現從專一到多元內涵的文化資本光譜。所以，美國上層菁英的文化資本變化與Bourdieu指出社會階級和文化消費之間的同源對應關係並不吻合，但菁英階級仍保有原初的高雅文化資本則未背離Bourdieu的文化再製模式。可惜的是，Peterson並非從社會流動觀點去思考文化資本被形構的機制。目前，我們並不清楚經歷代間教育流動的人會如何回應不一致的文化慣習之規範性期待，以及如何展現出文化資本內涵的殊異化。

## 二、三種社會化模式及其研究假設

本研究為了讓分析能聚焦在理論觀點的對話，檢視三種影響個人當前（current）文化資本的社會化脈絡：初始家庭社會位置、終點社會位置、出身與終點混合型社會化脈絡。不同的理論觀點對於初始家庭社會位置與終點社會位置的影響力孰輕孰重見解不一。文化再製觀點強調幼年時的生活脈絡對個人社會化的主導性，尤其是家庭背景內化的文化慣習。持此論點者認為在個人生命歷程中雖然仍會持續面對新的環境經驗、行為和態度，但早期幼年的社會化經驗仍是最深刻且具持續性的影響力（Maccoby, 2007; Mortimer & Simmons, 1978）。即使是社會流動研究也未否定「終點」會受到「出身」的影響（cf. Duncan, 1979），例如父母藉由篩選子女就讀學校、選擇讓孩子參與某些特定屬性的戶外活動，以及控制學齡前孩童的遊戲群，這些都是父母管控孩子社會化環境的方式。

過去的研究強調孩童時的生活經驗是形塑基本性格、培養相關習慣與偏

好的重要社會化脈絡，而成年時的社會化主要是建立特定社會規範與表面人格特質（Bourdieu, 1984, 1994; Mortimer & Simmons, 1978）。Bourdieu（1990: 56）未否認慣習是一種會包納新生活經驗的性格養成系統，但他主張這些新經驗是否被接受仍是透過孩童時期所建立的慣習過濾的結果。換言之，孩童比成年人更具可塑性，孩童時期的印記可以預期會持續貫穿整個生命歷程。依此觀點，音樂文化資本的主要構成內涵被預設是發展於孩童時期。所以，文化再製模式對應的研究假設是經歷社會流動者的文化資本會黏著在初始家庭的社會化脈絡。表現在音樂文化資本上，文化再製模式預期向上流動者會較偏好通俗性文化資本類型，或幾乎不消費。

但有許多研究對幼年時社會化經驗有深刻烙印作用的論點抱持質疑（Aschaffenburg & Maas, 1997; DiMaggio, 1982; Lahire, 2008, 2011）。DiMaggio（1982）和Aschaffenburg與Maas（1997）以文化流動模式說明孩童時的經驗和家庭背景可能僅部分地影響個人的文化資本。Lahire（2011）也表達不贊同初始社會化脈絡具有決定性的論點，認為人是受到多元社會化脈絡的影響，而且個人經常面對的情境是幼年慣習難以發揮作用的情況。Lahire延伸說明社會流動模式與再製模式的差異，認為人在面對不符合童年時期經驗的新情境時會迫使個人必須捨棄幼年時期所採用的方案，改以當下所處社會位置的生活模式去適應新的社會處境。這個觀點在後續的一些經驗研究中獲得佐證，例如發現社會流動者的審美觀（Daenekindt & Roose, 2013a）、文化實踐（Daenekindt & Roose, 2013b）、文化生活風格（Bourdieu, 1984）會受到終點社會位置的影響。所以，依據上述的觀點，社會流動模式的研究假設認為影響社會流動者音樂文化資本的最主要因素是終點的社會化脈絡，意即向上流動者會顯露偏好高雅音樂，而向下流動者則會發展出對通俗性音樂的喜好。

上述的文化再製和社會流動模式分別以出身和終點社會化脈絡作為理論假設的主要影響力，意味這兩種社會化脈絡在理論推演上被視為是不相容的。但一個經歷社會流動者不可能切斷所有來自與出身家庭背景有關的家人



或朋友等重要的社會連帶。所以，跨階層社會流動者可能具備更廣泛的文化本領，意即文化資本的跨界或不一致性是一種彈性調適外在社會環境的能力展現。Emmison (2003: 223) 稱此為對情境的社會脈絡之重要轉碼 (code-switch) 能力。Erickson (2008) 較早指出文化資本的多樣性是最有效的文化資源，且對文化多樣性形式的掌握度愈高，愈有助於擴展社會資本累積。Lizardo與Skiles (2012) 更直指多樣化內涵的文化資本已成為美學秉性的當代社會表徵。所以，不一致的文化資本可視為是以「添加」(add) 的方式在個人往後的社會流動過程中蒐集跨階層的文化資源，呈現包羅萬象的文化資本品項。這個研究假設的理論基礎來自Lahire (2008, 2011) 的不一致文化資本觀點。

雖然過去的經驗研究發現優勢階級子女的教育競爭優勢並未因教育擴張而有明顯減弱，但教育擴張所產生的結構性社會流動確實有助於增加底層家庭出身的子代流動到更高社會階層的機率 (參閱關秉寅、彭思錦、崔成秀, 2019; Chuang & Lin, 2017)。教育發展造成明顯的結構流動更是促成機會分布改變的最重要機制 (陳寬政、劉正, 2004)。所以，本研究會檢視這些向上流動者與上層低度流動的菁英之間是否有明顯的文化資本差異，以探討文化實踐作為一種階級區辨的有效性。依據上述的文化再製和社會流動模式，本研究於表1提出五個研究假設來說明代間教育流動的社會位置變化及其所形構出的五種音樂文化資本內涵：(一)文化再製模型強假設：子代只保留初始家庭背景所內化的文化慣習。這個結果最接近Bourdieu (1984, 1990, 1994)、Maccoby (2007) 及Mortimer與Simmons (1978) 等人的觀點；(二)文化再製模型弱假設：經歷社會流動者是以童年時家庭內化的文化資本為主，但也涉獵其他社會化脈絡的文化類型，故未全然跳脫Bourdieu強調原初家庭內化的關鍵角色。此假設預期社會流動經驗會影響音樂文化資本呈現雜食類型，故向上流動者的文化資本會是以通俗性文化為主的雜食，上層低度流動的菁英則維持純食高雅；(三)社會流動模型強假設：主張社會流動者會捨棄初始家庭社經位置所內化的文化資本，而重新學習終點社會位置的文

化資本內涵，如Daenekindt與Roose（2013a, 2013b）的研究結果支持此假設；(四)社會流動模型弱假設：以終點社會位置的文化資本為最主要的內涵，但也未完全拋棄幼年時養成的文化資本。DiMaggio（1982）、Aschaffenburg與Maas（1997）的文化流動模式說明弱假設的可能性；(五)文化資本不一致假設：除了童年時家庭內化的文化資本，終點的社會化脈絡所增添的文化資本也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故預期向上流動者的音樂文化資本會以不一致型態為主，上層低度流動和底層低度流動分別是純食高雅和幾乎不消費或通俗。Lahire（2008, 2011）的觀點是文化資本不一致假設的理論依據。

表1 各種理論觀點對文化再製與社會流動<sup>2</sup>形塑音樂文化資本的對立假設

理論假設	代間流動	上層低度流動	向上流動	底層低度流動
文化再製 模型強假設		純食高雅	純食通俗	通俗或幾乎不消費
文化再製 模型弱假設		純食高雅	雜食通俗	通俗或幾乎不消費
社會流動 模型強假設		純食高雅	純食高雅	通俗或幾乎不消費
社會流動 模型弱假設		純食高雅	雜食高雅	通俗或幾乎不消費
文化資本 不一致假設		純食高雅	不一致	通俗或幾乎不消費

<sup>2</sup> 本研究使用K-medoids對樣本資料進行分群，分析顯示將流動型態分成三類，分別是向上流動、上層低度流動、底層低度流動。低度流動包含了不流動與低度流動者。本研究在「參、研究方法」的「二、分析變項」有詳細的討論。

## 參、研究方法

###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使用2007年對全國18歲以上國民進行施測的「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第三次社會階層組資料（以下簡稱社會變遷調查）<sup>3</sup>。社會變遷調查問卷在「生活型態」題組有詳細測量受訪者消費各種音樂的程度，每項音樂活動題目的選項皆為「經常」、「有時」、「很少」和「從不」，故能同時兼顧文化資本內涵的深度與廣度面向，適合用來分析潛在文化資本類型。調查資料中也包含詳細的人口特質，包括性別、年齡、省籍、父與子的教育程度、收入、客觀階級、主觀認知社會地位分數等資訊（張芷雲、廖培珊，2008）。這些資訊提供本研究檢視上述的研究假設。

音樂文化資本是本研究的依變項。但不同於先前研究較側重文化資本的深度，即探討不同的社會階層對於特定文化類型的偏好程度，或僅討論廣度，即認為社會階級的區辨在於掌握文化類型的多樣性。本研究認為應該同時關照音樂文化資本的深度和廣度才能完整分析文化資本。所以，對於資料的挑選不能僅測量消費者最常消費或最偏好的文化活動，例如2002年社會變遷調查第四期第三次社會階層組資料、2018年第七期第四次的全球化與文化組資料；也不能僅測量消費者偏好的文化類型差異與多寡，例如2007年社會變遷調查第五期第三次休閒生活組資料。對於音樂活動的潛在類型，2007年第五期第三次社會階層組資料有足夠的資訊可以反映受訪者在不同音樂活動上是否消費及消費頻率，進而能夠計算出文化消費的深度和廣度。在分析方

---

<sup>3</sup> 本研究嘗試在目前已有的全國性次級調查資料（庫）中尋找較合適的分析資料，希冀去回應（填補）臺灣社會變遷過程中理論與實證研究和社會變遷之間的落差。雖然本研究可能無法反映「當前的」社會現況，但可以探討臺灣社會變遷過程中「曾經有過」的重要現象，也可能是仍在「進行中」的現象。所以，本研究對於「過去的」臺灣社會之瞭解是重要的，對於「當前的」認識更能啟著學術知識積累和承先啟後的重要意義。

法上則使用適合等距尺度或順序尺度的分群演算法。

## 二、分析變項

本研究以受訪者消費九種音樂文化品項的頻率和是否消費來建構文化資本集群（cluster），作為依變項。自變項有人口特質、家庭背景及社會階層變項。人口特質變項包括性別和年齡。家庭背景因素包括省籍、父子代間教育流動型態。代間教育流動型態是透過K-medoids分群方法將父子教育流動進行集群分析。社會階層變項有受訪者主觀認知社會地位分數、收入、客觀階級。主觀認知社會地位分數是以受訪者主觀認定其相對於他人的社會地位分數來採計。客觀階級則是根據Erikson與Goldthorpe（1992）的EGP階級分類架構，將受訪者職業的ISCO-88國際標準職業分類碼對照EGP分類進行編碼，共分成六類。以下將對依變項和自變項做詳細的說明：

### （一）音樂文化資本變項

本研究以「請問您常不常聽下面這些音樂和戲劇」建構出依變項。受訪者回答關於臺語流行歌曲、國語流行歌曲、日本流行歌曲、西洋流行歌曲、古典音樂、國樂、平劇、歌仔戲與布袋戲等九種音樂類型的消費頻率和是否消費，並以1至4分表示「從不」、「很少」、「有時」、「經常」。本研究採用K-medoids分群演算法（Kaufman & Rousseeuw, 1990）找出最佳的分群方式及相關的群中心，即以各群體內部變異加總值（total within-cluster sum of square, WSS）趨於收斂的轉折點作為最佳的分群數目。在比較K-medoids的WSS之後，發現2007年的臺灣社會可以依據音樂文化資本區分出五種集群（如表2和圖1）。這個結果說明音樂作為一種文化實踐具有鮮明的區辨效果。以下將先分析這五種集群所偏好的音樂品味及其意義。

本研究對這五種音樂文化資本集群的命名是依據受訪者消費各項音樂的廣度和深度是否高於整體均值作判準（如表3）<sup>4</sup>。第一群命名為「幾乎不消

<sup>4</sup> 「廣度」是指消費音樂「種類」的多寡，本研究以受訪者「是否」消費該種音樂做測量，將「經常」、「有時」、「很少」視為有消費，「從不」

表2 音樂文化資本的各群組內變異加總

K 群	WWS	與 K-1 差異
1	8430	
2	6776	1654
3	5963	813
4	5432	531
5	4850	581
6	4660	191
7	4488	172
8	4264	224
9	4163	100
10	4047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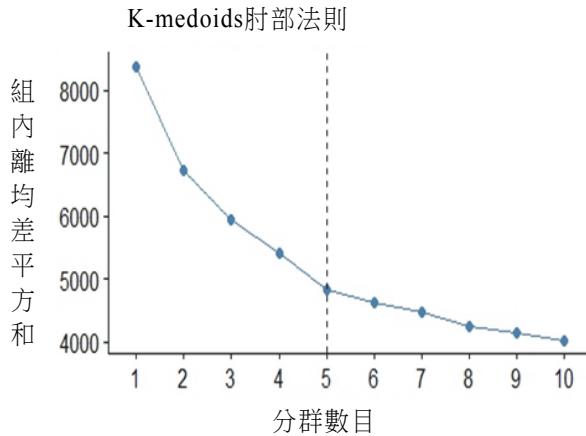


圖1 音樂文化資本的肘部法則曲線

費」是因為該群在各項音樂消費上的廣度與深度皆遠低於整體平均值，表示該集群對任何類型的音樂文化之消費程度極低或可視之為幾乎不消費。第二

視為無消費，而表3的百分比數值即是說明「該群體有百分之多少比例消費了該種音樂」。「深度」是指消費音樂的「頻率」，本研究先用1至4分計算受訪者消費該種音樂的頻率，分數愈高表示愈深入（深度），最後再計算不同群體在各項音樂的平均值，作為深度的測量量數。

群為「純食流行音樂」的消費廣度與深度高於整體平均的部分僅在臺語流行歌曲和國語流行歌曲，意味較明顯偏好這兩種音樂。第三群的音樂消費屬性是國語流行歌曲、日本流行歌曲、西洋流行歌曲和古典音樂的涉略廣度及深度均高於整體平均值，而其他項目則低於整體平均，故稱此群體為「純食高雅音樂」。第四群與第五群異於其他三群的是其多樣性特質，而這兩群之間的差異則是消費深度，大抵說明他們的音樂文化資本呈現多樣的雜食性。但從消費深度的差異顯示第四群對臺語流行歌曲、歌仔戲與布袋戲的消費深度相對較高，西洋流行歌曲和古典音樂的深度則低於整體平均值，故屬於「雜食且偏好在地音樂」。第五群則是每項音樂文化都有高於平均的消費，但在臺語流行歌曲、歌仔戲和布袋戲的消費深度又低於「雜食且偏好在地音樂」者，所以這個集群的特質是雜食且偏好高雅音樂，本研究稱之「不一致的雜食」。綜上結果，雜食群體的比例最高且內部還可再分成偏好高雅與在地音樂兩類，純食群體內部也有高雅和流行音樂的差異。在一個社會流動明顯的臺灣社會，雜食群體占有最高比例，故需要進一步分析社會流動與音樂文化資本的關係，以釐清文化資本作為社會階層之間的劃界與跨界樣貌。

## (二)人口特質變項

1.性別：分為男性和女性。進行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時以男性為虛擬變項的對照組。

2.年齡：以問卷調查年份減去受訪者的出生年得出年齡。

## (三)家庭背景變項

1.省籍：原始調查資料將受訪者的省籍依據父親是哪裡人區分為臺灣閩南人、臺灣客家人、大陸各省市及臺灣原住民。但原住民樣本數較少，為確保統計模型的穩定性，故排除原住民樣本。在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中以閩南人為三分類虛擬變項的對照組。

2.代間教育流動型態：父子代間教育流動是本研究探討受訪者受異質性社會化脈絡影響的重要變項。先前研究處理代間教育流動時通常以兩者教育年數的相減值來判斷向上、向下或不流動，但忽略了被歸類為同一種流動型

表3 音樂文化資本的五分群

	幾乎不消費	純食流行	純食高雅	雜食在地	不一致	平均
廣度 (%)	臺語	74	<b>100</b>	88	<b>99</b>	91
	國語	59	<b>100</b>	<b>99</b>	<b>96</b>	90
	日本	11	23	<b>77</b>	<b>71</b>	57
	西洋	16	22	<b>99</b>	<b>67</b>	62
	古典	11	15	<b>71</b>	<b>55</b>	51
	國樂	6	7	19	<b>34</b>	29
	平劇	2	1	4	<b>20</b>	16
	歌仔戲	22	14	8	<b>81</b>	42
	布袋戲	23	10	12	<b>86</b>	44
	深度	臺語	1.95	<b>3.43</b>	2.28	<b>3.19</b>
國語		1.68	<b>3.25</b>	<b>3.30</b>	<b>3.00</b>	2.89
日本		1.12	1.24	<b>2.13</b>	<b>1.91</b>	1.83
西洋		1.16	1.22	<b>2.91</b>	1.83	2.02
古典		1.14	1.19	<b>2.01</b>	1.65	1.75
國樂		1.06	1.09	1.22	<b>1.37</b>	1.36
平劇		1.02	1.01	1.05	<b>1.21</b>	1.17
歌仔戲		1.28	1.17	1.08	<b>2.17</b>	1.57
布袋戲		1.30	1.11	1.14	<b>2.34</b>	1.64
<i>n/N</i>		281 (20.5%)	198 (14.4%)	315 (22.9%)	368 (26.8%)	212 (15.4%)

註：廣度的百分比數值是指該音樂文化資本群體中有多少百分比「有」參與該項音樂。深度的數值是以平均數來呈現不同音樂文化資本群體在各項音樂消費的頻率之平均值。*n/N*是五個音樂文化資本群體的數量和總數量。

態的群體內部有異質性，例如「父親教育年數6年且子代教育年數13年」和「父親教育年數12年且子代教育年數14年」的特質相似性可能遠低於「父親教育年數6年且子代教育年數13年」和「父親教育年數6年且子代教育年數8年」<sup>5</sup>。集群分析方法中的K-medoids能夠減少等距尺度或順序尺度資料中群

<sup>5</sup> 附表1的群數3和群數4的第1組都是「上層低度流動」，第2組也同樣屬於「底層低度流動」。但群數4的第2組和第3組是群數3的第2組再細分流動型態。群數4的第2組和3組可分別命名為「底層結構流動」和「向上流動」。

體內部異質性的問題。因此，本研究以K-medoids將父子代間教育流動型態做分群，演算的邏輯是依據資料自身屬性計算彼此之間的相似度，讓子集合間的差異最大化，子集合內差異最小化。因此，本研究計算區分成一至十群的各群WSS，藉由肘部法則（Elbow Method）選出最適的分群組數為三群<sup>6</sup>。從分群的結果看出各群鮮明的特質，分別為父代平均教育年數12.48年且子代為14.84年的「上層低度流動」、父代5.68年且子代11.80年的「向上流動」、父代0.54年且子代5.41年的「底層低度流動」。在進行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時，「底層低度流動」是虛擬變項的對照組。

#### (四)社會階層變項

##### 1.主觀認知社會地位分數

採用問卷題目「社會中有人的地位高，有人的地位低，如果以1至10分代表社會地位的高低，請問你認為自己的分數為幾分」，分數愈高表示受訪者主觀認知自身的社會地位愈高。

##### 2.收入

收入是重要的經濟資本指標，其和文化資本之間具有可轉換性。本研究以「請問您平均每月的工作收入是多少」來測量受訪者的收入。此題的選項是無收入、1萬元以下、1至2萬元開始每個級距增加1萬，最高至30萬元以上。在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中，收入以千元為單位且以各級距的中位數處理之。

##### 3.客觀階級

本研究以Weber的階級概念為基礎，採用Goldthorpe（1987）的階級架構。以受訪者職業的ISCO-88國際標準職業分類碼對照EGP階級分類架構（Erikson & Goldthorpe, 1992），進行編碼與分類。此架構

---

本研究已分析過父子代間教育流動三分群和四分群的多元邏輯迴歸，四群的分析結果並沒有比三群產生更豐富的訊息，故最後採用三分群作為分類。

<sup>6</sup> 綜合附表2和附圖1，WSS值出現明顯收斂的轉折點是在區分三群和四群之間，表示父子教育流動情形以三群為較佳的分群組數。



將相似市場情境和工作情境的職業地位組合成相同的階級。在本研究分析中將階級身分分成專業人員、事務人員、自營作業者、農民、技術體力勞動工人、非技術體力勞動工人，對照組是非技術體力勞動工人。

### 三、分群方法與依變項的建構

本研究的依變項「音樂文化資本類型」和自變項之一的「代間教育流動型態」是採用分群演算法將樣本做分類。此方法是將 $n$ 筆資料按照相似度分割成 $k$ 個不同子集群，利用觀察值的變異量差異進行分組，期望達到子集群之間的相異性最大和子集群內部的同質性愈高愈好（Han, Kamber, & Tung, 2001）。分群方法所處理的資料不需要事先給定目標變數，而是計算每一個樣本點到各個子集群的重心點距離來決定每一個樣本點適合被分派到離其最近的集群。憑藉此優點，本研究挖掘出潛藏在音樂消費數值表徵下的特質結構。

K-medoids和K-means是分群方法中較常被採用的方法，兩者較明顯的差異是計算群內重心點的規則不同。K-medoids是計算中位數，k-means則是採計集群內的平均值。所以，K-medoids能夠避免K-means易受極端值（outliers）影響的疑慮。而且，以中位數做計算能讓分析的測量尺度從K-means限制的等距尺度擴展到順序尺度。此外，K-medoids處理最小化相異度加總值時也明顯優於K-means，而非僅是計算樣本點到重心點的歐幾里德距離（Euclidean Distance）之平方和。因此，K-medoids更適合本研究去探索資料背後的潛藏結構。對於如何決定最佳分群組數，本研究以R統計軟體（3.3.3版本，2017年3月6日釋出）和R軟體中Factoextra套件所提供的肘部法則作為判斷分群組數的參考依據。當區分為 $k+1$ 群時的總變異量未再明顯低於 $k$ 群，表示WSS趨於收斂的轉折點出現，可依此視 $k$ 群為最佳的分群組數。

本研究的依變項是使用K-medoids對九種音樂文化品項的消費做分群，

以檢視潛藏在眾多音樂文化資本表徵下的複雜結構。表2是比較區分成一至十群的結果，顯示WSS隨著k群的數目增加而下降，但五群之後的WSS下降幅度明顯變小。進一步以肘部法則曲線圖做輔助判斷（如圖1），分群數量超過五群之後的WSS曲線坡度變得相對平緩。這表示超過五群之後所增加的分群組數不僅對資訊的增益非常微小，且增加後續分析解讀上的複雜度。為了兼顧樣本數值所反映的訊息飽和量與後續分析的精簡性，判斷五群為最佳分群組數。所以，2007年的臺灣社會可以用五種音樂文化資本集群來說明群體之間的差異。

五群較四群更加合適，除了有數理運算作為基礎，五群能夠看出雜食群體內部的異質性。比較四分群和五分群的差異（如表4），發現這兩種分群組數的第一至第三組音樂文化資本集群有十分接近的人數比例，依序的命名都是幾乎不消費、純食流行音樂、純食高雅音樂。四分群中的第四群「雜食」在五分群中可再分成兩種不同類型的雜食，一類是雜食且偏好在地音樂，另一類為不一致的雜食。而且區分五群時的WSS比四分群有明顯的降幅（如表2），表示以五分類說明臺灣社會的分群特質具有解釋力。從「雜食且（較）偏好在地音樂」和「不一致的雜食」的合計比例，顯示2007年已是雜食者多過於純食者。相較於Peterson和其同事對美國社會變遷過程發生的雜食現象之描繪，本研究對雜食群體的分析更進一步指出群體內部的異質性，同時也發現過去國內研究未曾提出的「不一致的雜食」。但這五種音樂文化資本集群是否連結到不同的社會流動模式？經歷社會流動者是否比低度流動者有更鮮明的雜食音樂文化？臺灣社會究竟較符合哪一種研究假設？本研究透過代間教育流動來檢視上述的提問。

## 肆、分析結果

社會流動與音樂文化資本的關聯性為何？表5的卡方檢定顯示不同型態的代間教育流動有顯著差異的音樂文化資本類型。上層低度流動者最主要的

表4 不同群數的音樂消費結果

群數	第 k 群	臺語	國語	日本	西洋	古典	國樂	平劇	歌仔戲	布袋戲	n/N
4	1	1.94	1.67	1.12	1.16	1.13	1.03	1.02	1.26	1.28	273
	2	3.42	3.27	1.24	1.22	1.16	1.01	1.00	1.16	1.10	186
	3	2.28	3.31	2.26	3.03	2.08	1.21	1.08	1.10	1.15	321
	4	3.14	3.10	2.12	2.13	2.04	1.71	1.35	2.09	2.24	594
5	1	1.95	1.68	1.12	1.16	1.14	1.06	1.02	1.28	1.30	281
	2	3.43	3.25	1.24	1.22	1.19	1.09	1.01	1.17	1.11	198
	3	2.28	3.30	2.13	2.91	2.01	1.22	1.05	1.08	1.14	315
	4	3.19	3.00	1.91	1.83	1.65	1.37	1.21	2.17	2.34	368
	5	3.04	3.36	2.76	2.93	2.86	2.21	1.65	1.99	2.10	212
整體		2.74	2.89	1.83	2.02	1.75	1.36	1.17	1.57	1.64	1374

(比例最高)音樂文化資本是純食高雅音樂；向上流動者以雜食且偏好在地音樂最多；幾乎不消費是底層低度流動者的音樂文化資本中占比例最高的類型。從最主要的文化資本類型可以發現社會流動經驗最鮮明的向上流動者是三種流動型態中唯一展現出雜食特質的群體，表示跨界的流動經驗會讓個人在流動過程中增添多種社會化脈絡的文化資本，而其他兩類低度流動者則分別是純食和幾乎不消費。所以，由上述的結果可以得知原初家庭背景是形塑音樂文化資本的最主要社會化脈絡。

比例次高的音樂文化資本類型也占有一定的比重。上層低度流動者的「不一致的雜食」，向上流動者的「幾乎不消費」，以及底層低度流動者的「雜食且偏好在地音樂」都有不低的比例。這些沒有明顯跨階層流動經驗的上層和底層低度流動者也有部分的雜食性品味，表示除了家庭背景因素之外，Lahire (2008, 2011) 指出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非階級性因素也起了影響效果，或是出現如Bauman (1998, 2001)、Chan與Goldthorpe (2007, 2010) 等人描繪的後現代社會進程中的「個人自我實現」(individual self-realization) 現象。這說明各種代間教育流動群體內部的文化資本類型具有異質性，也意味初始家庭背景雖是最重要的社會化脈絡，但並非唯一，故初步推論表1的文化再製模型弱假設是最符合臺灣社會的情況。

表5 各變項與音樂文化資本類型的列聯表

	幾乎 不消費	純食 流行	純食 高雅	雜食 在地	不一致	整體/ 總平均	$\chi^2/F$
性別							3.8
女	19.1 (118)	15 (93)	24.3 (150)	25.2 (156)	16.3 (101)	100 (618)	
男	21.6 (163)	13.9 (105)	21.8 (165)	28 (212)	14.7 (111)	100 (756)	
省籍							31.7***
大陸	15.5 (20)	9.3 (12)	38 (49)	17.1 (22)	20.2 (26)	100 (129)	
客家	21.4 (40)	13.9 (26)	26.7 (50)	27.8 (52)	10.2 (19)	100 (187)	
閩南	20.9 (221)	15.1 (160)	20.4 (216)	27.8 (294)	15.8 (167)	100 (1058)	
客觀階級							214.6***
自營業者	24.6 (48)	18.5 (36)	11.8 (23)	34.4 (67)	10.8 (21)	100 (195)	
技術體力工	17.4 (26)	19.5 (29)	15.4 (23)	31.5 (47)	16.1 (24)	100 (149)	
事務人員	17.2 (56)	12.9 (42)	27.4 (89)	26.8 (87)	15.7 (51)	100 (325)	
非技術體力工	26.1 (70)	20.5 (55)	13.4 (36)	31 (83)	9 (24)	100 (268)	
專業人員	11.9 (44)	7.3 (27)	38.3 (142)	18.6 (69)	24 (89)	100 (371)	
農民	56.1 (37)	13.6 (9)	3 (2)	22.7 (15)	4.5 (3)	100 (66)	
代間教育流動							303.0***
上層低度流動	8.5 (31)	6.8 (25)	43.7 (160)	13.7 (50)	27.3 (100)	100 (366)	
向上流動	19.6 (155)	16.8 (133)	19.1 (151)	31.8 (251)	12.7 (100)	100 (790)	
底層低度流動	43.6 (95)	18.3 (40)	1.8 (4)	30.7 (67)	5.5 (12)	100 (218)	
年齡	50.7	43.5	34.0	45.0	41.3	42.8	63.7***
主觀地位分數	4.1	4.6	5.0	4.6	5.0	4.7	15.7***
收入(千)	25.8	27.6	39.9	33.2	40.6	33.6	10.1***

註：1.性別、省籍、客觀階級、代間教育流動與五種音樂文化資本類型的交叉表中之數值為列(row)百分比，而括弧內的數值則是樣本數。年齡、主觀地位分數與收入變項的數值為平均值。2.在表格最右邊的一欄(column)針對各變項的檢定結果。性別、省籍、客觀階級、代間教育流動與五種音樂文化資本進行卡方檢定( $\chi^2$ )，而年齡、主觀地位分數與收入則是F檢定。

\*\*\* $p < .001$ .

各種代間流動都有兩種或以上的音樂文化資本類型，而且彼此也有相似的情形，例如底層低度流動者的次要音樂文化資本類型和向上流動者主要的音樂類型所占比例十分相近。所以，假若某群體的主要文化資本類型不構成區辨他群的特質時，次高或相對較少比例的音樂文化資本類型可能就成為秀異的重要條件。因此，本研究認為先前相關研究將特定群體的最主要文化資本視為區辨其他群體的特質，這樣的研究想像可能並不符合臺灣社會的實際情況。為了進一步探討代間教育流動型態和音樂文化資本之間的複雜關係，以下將使用多重對應分析和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做進一步的檢視。

多重對應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的視覺化空間分布適合用來掌握客觀階級、代間教育流動和五種音樂文化品味這三種主要變項的多重相關性。圖2的空間向量說明代間教育流動和音樂文化資本型態有群聚的對應關係，客觀階級和音樂文化資本型態也有特定的親近性。上層低度流動者座落在縱軸的左側，向上流動者和底層低度流動者是在右側，表示上層低度流動和底層低度流動有音樂文化資本類型上的差異，向上流動者的空間位置也說明其音樂資本型態會較接近底層低度流動者。上層低度流動與純食高雅音樂、不一致的雜食都有明顯的親近性，底層低度流動者則相對較靠近幾乎不消費型態。向上流動者除了比上層低度流動者更接近雜食且偏好在地音樂及純食流行音樂，其與底層低度流動者同樣座落在縱軸的右側則說明兩者的音樂文化資本會有相似性。但虛線A與第一象限的空間向量之交叉點位於該向量的正值，而虛線B與之交叉點為負值，表示「幾乎不消費」的特質會是向上流動者和底層低度流動者之間鮮明的音樂文化類型差異。

從客觀階級的空間位置，發現專業人員的音樂偏好和上層低度流動者都是純食高雅音樂和不一致的雜食。自營作業者和非技術工也有高度同質性的音樂喜好，故不易區辨；兩者的音樂偏好是雜食且偏好在地音樂、幾乎不消費，以及純食流行音樂。技術工和非技術工同樣都親近雜食且偏好在地音樂、純食流行音樂，但兩者似乎又可區別出非技術工有幾乎不消費的特質。非技術工的兩種主要音樂文化資本類型是幾乎不消費和純食流行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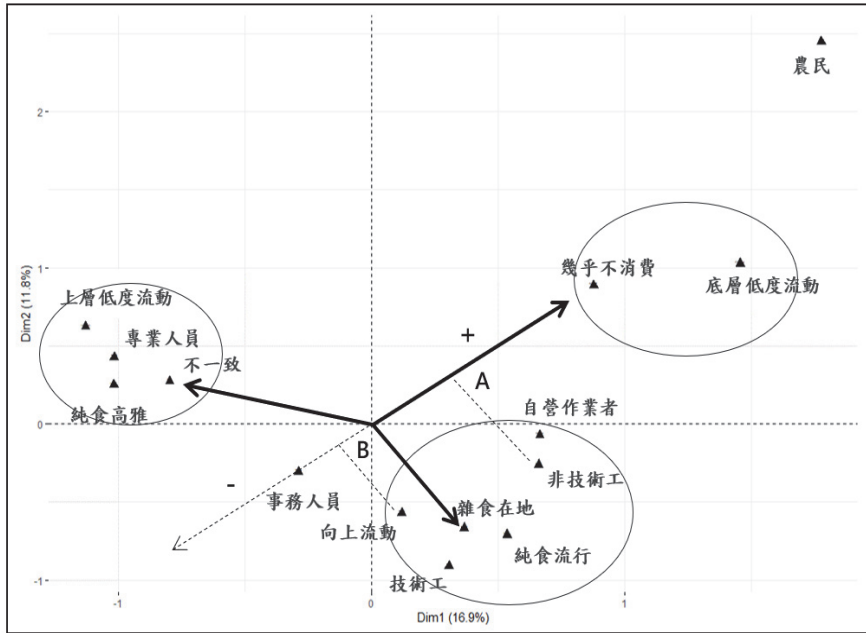


圖2 音樂文化資本的多重對應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使用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做必要的統計控制，檢視向上流動者和其他兩種流動型態的音樂文化資本是否有顯著的差異，也釐清其他因素對音樂文化資本的影響。表6對社會階層因素、人口變項等做統計控制，發現代間流動型態確實影響音樂文化資本的形塑。以不一致的雜食作為對照組，底層低度流動者明顯比向上流動者更偏好幾乎不消費，上層低度流動者則是展現出不一致的雜食和純食高雅音樂來區隔底層低度流動者。若以純食流行音樂作為對照組，底層低度流動者和向上流動者之間的差異是後者的音樂文化資本較傾向純食高雅音樂<sup>7</sup>。但也發現原本在多重對應分析圖中向上流動者所親近的純食流行音樂並無法與底層低度流動者的幾乎不消費特質產

<sup>7</sup> 見附表3的報表結果。

表6 音樂文化資本的多類別邏輯迴歸

	幾乎不消費	純食流行	純食高雅	雜食在地
性別 (男 <sup>a</sup> )				
女	-.377	-.121	-.123	-.306
年齡	.016	-.016	-.062***	-.001
省籍 (閩南人 <sup>a</sup> )				
大陸各省市	.323	.212	.811***	.038
客家人	.601	.503	.714	.578
代間教育流動 (上層低度流動 <sup>a</sup> )				
向上流動	-.848*	-.670	.500	-.526
底層低度流動	-2.173***	-2.161***	0.670	-1.975***
主觀地位分數	-.196**	-.031	-.005	-.082
收入 (千)	.005	.008*	.002	.002
階級 (非技術工 <sup>a</sup> )				
專業階級	-.789*	-1.252***	.080	-.807**
行政階級	-.343	-.660	.002	-.273
自營階級	-.177	.080	.151	.049
技術工	-.944*	-.553	-.518	-.594
務農階級	.694	.027	-.467	.002
截距	2.131***	2.569***	2.257**	2.394***
-2LL		3787.378		
Cox&Snell			.316	
Nagelkerke			.330	
N		1374		

註：1. 依變項的對照組是「不一致的雜食」；2.<sup>a</sup>為對照組；3. 表中所列數值為迴歸係數 (B)。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生顯著性的區隔<sup>8</sup>。再比較向上流動者和上層低度流動者的音樂文化資本差異，發現上層低度流動者的不一致的雜食特質足以區辨向上流動者<sup>9</sup>。上層

<sup>8</sup> 本研究也分析過以「雜食且(較)偏好在地音樂」為對照組，發現向上流動者和底層低度流動者並未在「雜食在地音樂」和「幾乎不消費」之間有顯著具區辨性的偏好。

<sup>9</sup> 見附表4的報表結果。

低度流動者比底層低度流動者更明顯是不一致的雜食和喜好純食高雅音樂。綜上結果，不一致的雜食特質凸顯出上層低度流動者的與眾不同，其純食高雅的音樂偏好也能夠對底層低度流動者做出區辨。同時值得注意，純食高雅和不一致的雜食並非向上流動者最主要和次要的音樂文化資本類型，但卻是顯現出和底層低度流動者之間的重要歧異點。

上述的研究發現顯示不同流動型態者之間的文化資本區隔有其社會行動的意義值得探討。上層低度流動者除了以純食高雅音樂作為最主要的音樂文化資本之外，同時也越界去熟悉其他階層的音樂以建構不一致的雜食特質，藉此來區辨人數日益增加的向上流動者對上層音樂文化資本的仿效。所以，上層低度流動者試圖透過音樂文化資本的跨界以做更進一步的劃界。向上流動者則在保有最主要的「雜食且（較）偏好在地音樂」特質之外，也藉由音樂文化跨界的實踐去親近純食高雅文化來提升社會地位，藉此區隔仍停留在底層的他者。但相對於掌握多樣性音樂文化能力佳的上層低度流動者，向上流動者仍難以掩飾自身過往曾是底層者的音樂文化偏好，例如雜食且（較）偏好在地音樂及幾乎不消費的特質。由於向上流動者相對於其他兩種類型的流動者具有更異質的社會化經驗，也因此展現出較複雜的跨界與劃界的社會實踐行動來建構其音樂文化資本，即不僅要努力追趕和仿效上層低度流動者的高雅音樂文化，同時需要對底層低度流動者做出區隔以凸顯殊異。故經歷較明顯的社會流動者確實如 *Aschaffenburg* 與 *Maas*（1997）、*DiMaggio*（1982）、*Lahire*（2008, 2011）等持社會流動論觀點者所言的具備添加跨階層的音樂文化資本能力。但與社會流動觀點不同的是，這群行動者的最主要音樂文化資本仍黏著在初始家庭的社會化脈絡之中。此外，初始家庭的社會化影響力呈現在上層和底層低度流動者身上也同樣清晰可見，前者以純食高雅為主，後者以幾乎不消費的比例最高。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文化再製模型弱假設獲得支持。

此外，表6也顯示性別在音樂文化資本分群上的差異不大，人口特質中的年齡比性別更明顯影響音樂文化資本的分群。但來自歐美的研究發現性別



的差異會是出現在較年輕的階段，即孩童和青少年時期（Katz-Gerro & Jaeger, 2013; Lehman & Dumais, 2017; Schmutz, Stearns, & Glennie, 2016）。臺灣社會是否有相同的現象則需要未來特別針對年齡與性別的文化資本差異性做深入的探討。尤其是當性別作為一個獨立於階級之外的影響因子時會如何影響文化資本的教養內容<sup>10</sup>，目前我們所知仍十分有限。DiMaggio與Mukhtar（2004: 99）曾指出文化社會學長期忽視性別對文化養成的影響。關於性別與文化資本的關係至21世紀初期仍未受到實證分析太多的關注（Christin, 2012）。但近期已陸續有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參加藝文展覽活動或閱讀文學書籍（Christin, 2012; Falk & Katz-Gerro, 2016），以及投資更多的正規文化（legitimate culture）<sup>11</sup>（Christin, 2012; Hallmann, Artime, Breuer, Dallmeyer, & Metz, 2017）。然而，性別影響文化資本的機制仍然不清楚。為了避免研究焦點模糊，本研究僅將性別和年齡視為控制變項，未再對這兩種因素做進一步分析。

主觀階級認同和文化資本的關係也有不少的討論，主要多視文化資本為影響主觀認知社會地位因素的自變項（如姜添輝，2001；莊致嘉、游騰林，2016；Marsh & Hsu, 1994）。在影響文化資本的重要因素中，主觀認知社會地位的影響力甚至高過於收入（莊致嘉、游騰林，2016）<sup>12</sup>。本研究發現主觀認知社會地位的影響效果有較明顯的差異是發生在「幾乎不消費」和非「幾乎不消費」的群體之間。幾乎不消費和不一致的雜食之差異（如表6），以及幾乎不消費和純食流行之間（如附表3），都有明顯不同的主觀認

<sup>10</sup> 普遍探討性別如何影響高雅文化的研究都是將性別的效果與社會階級及教育成就效果交纏在一起討論（Christin, 2012）。這樣的思考明顯是受到Bourdieu（1984: 107）主張性別是相對於社會階級（social class）的次要原則（secondary principle）所影響。

<sup>11</sup> Bourdieu（1984）在《秀異：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中強調對正規文化的掌握和對康德式美學（Kantian aesthetics）的應用是兩個等級分層的重要準則，而文化資本高是指在這兩方面都如魚得水。

<sup>12</sup> 本研究發現收入的差異性僅明顯出現在「不一致的雜食」和「純食流行音樂」群體之間。收入愈高者愈傾向於「不一致的雜食」。

知社會地位，即具有幾乎不消費特質者有較低的主觀認知社會地位。當然，本研究並未排除兩者有互為因果的雙向影響關係。

客觀階級與音樂文化資本的關聯性分析時常用來檢視階級概念在當代社會的有效性（Bauman, 1998, 2001; Chan & Goldthorpe, 2007）。本研究發現客觀階級對音樂文化資本仍有顯著的影響作用，所以2007年的臺灣社會還未全面出現如個人化論所預言的文化品味脫離它原先在社會階層中的連結基礎。<sup>13</sup>專業人員和技術體力工的音樂文化資本明顯不同於非技術體力工。專業人員更傾向不一致的雜食，非技術體力工則較偏好幾乎不消費、純食流行音樂、雜食且（較）偏好在地音樂。這表示臺灣社會的上層階級（專業人員）並非如Bourdieu觀察法國社會發現的純食高雅文化，也不同於Peterson的雜食概念，而是在上層階級中出現音樂文化資本型態是純食高雅以外的不一致的雜食特質。但技術和非技術體力工之間的文化資本無法透過幾乎不消費、純食流行音樂、雜食且（較）偏好在地音樂而獲得有效的區辨，也不是偏好幾乎不消費或純食高雅音樂之間的差異。這兩種社會階級的音樂文化資本區隔是技術體力工比非技術體力工更偏好不一致的雜食。

綜合上述的研究發現，文化再製模型弱假設符合當時臺灣社會的描繪。而且，臺灣社會的階級與音樂文化資本之關係不是某個階級和特定音樂資本的單一對應，也不適合以純食和雜食、高雅與通俗的二分來區辨，而是同一階級群體中存在群組內的文化資本異質性，以及同樣是雜食類型的「不一致的雜食」和「雜食且（較）偏好在地音樂」是分別對應到不同的階級。

---

<sup>13</sup> 個人化論源自學者們對階級概念在當代社會的有效性質疑。他們認為文化品味正脫離它原先與社會階層的連結基礎，變得更像是「個人的自我實現」（individual self-realization）（Bauman, 1998, 2001; Chan & Goldthorpe, 2007, 2010），意即個人從事文化消費時愈來愈能夠按照自身的興趣進行選擇。

## 伍、討論與結論

依據Bourdieu (1984, 1990, 1994) 的觀點，文化資本是一場慣習養成的內化和持久訓練，而且文化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緊密扣連出身起源的社會階層。但Lamont (1992) 指出Bourdieu的文化再製觀點之適用性易受社會流動程度的影響。因此，本研究要探討經歷明顯的結構性流動和代間流動之臺灣社會，文化資本的形塑較接近文化再製模式，抑或是社會流動模式？文化資本的區辨會呈現何種樣貌？本研究將文化資本與社會流動的關聯性分析之焦點擺放在文化再製和社會流動理論的核心對話，並以音樂文化的實踐行為作為測量文化資本的指標，探討代間教育流動的社會化脈絡是否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歧異點在音樂文化資本的實踐中變得更加鮮明，藉以回答文化再製觀點和社會流動理論對於文化資本形塑的解釋效力。以下是主要的研究發現：

### 一、文化資本的劃界

音樂是測量文化資本概念的有效指標 (Peterson & Simkus, 1992)，也是階層社會化的強勢指標 (Coulangeon, 2005)，以及品味殊異化的表徵 (Van Eijck, 2001)。因此，本研究以受訪者經常聆聽的音樂品項之頻率來測量音樂文化資本。此份研究使用K-medoids分群法來判斷集群的組數，再輔以受訪者涉略音樂的深度和廣度去命名音樂文化資本集群。本研究發現臺灣社會在2007年的音樂文化資本集群能夠區辨出五種，包括：幾乎不消費、純食流行音樂、純食高雅音樂、雜食且偏好在地音樂、不一致的雜食。這表示臺灣社會能夠透過音樂文化資本區辨出群體之間差異，故音樂文化資本是重要的劃界指標。

以音樂文化資本來劃界，第一種群體對各類音樂的消費皆遠低於總體平均的廣度和深度，故其特質是幾乎不消費。這個群體在過去相關文獻中較少被提及，他們與客觀階級中的非技術工、自營作業者有親近性，顯示地位團

體對音樂的選擇展現出階級慣習。他們表現出Bourdieu (1984) 指出的文化棄權樣態，這或許是反映出努力掙扎於日常生活中迫切的基本生活需求仍待滿足，而且也無興趣追求難以帶來實質經濟報酬和難以轉換成其他實用性資本的純正文化。幾乎不消費也透露出對高雅文化缺乏解碼能力 (e.g. Katz-Gerro & Jaeger, 2013; Peterson, 2005; Warde, Martens, & Olsen, 1999)，或有一種缺乏文化開放性的世界主義意識形態觀 (DiMaggio & Bryson, 2000)。朱元鴻 (1997: 126) 以反諷的語彙說明這群在階層競爭中劣勢的「俗眾」是一群：

既缺乏文化資本、不甚有文化善意，也對純正文化毫無需求。……  
「俗眾」並非是與審美品味不相干的群落。……「俗眾」早已涉入階層的鬥爭，被動地成為品味與正當性的負面襯底。

在臺灣社會，隨著音樂文化資本作為一種階層或生活風格的劃界，幾乎不消費的群體實是被排拒在外。所以，「品味有分類，而且還可分類那些分類者」 (Taste classifies, and it classifies the classifiers) (Bourdieu, 1984: 6)。

音樂文化資本的劃界也出現在純食和雜食兩種特質的群體之間，而且雜食和純食群體內部還有各自的異質性。這項研究發現將過去相關文獻對於純食和雜食的認識再進一步做細緻的分類。本研究發現文化資本並不純粹是用純食或雜食來表明自己與他人之間的社會距離，而是以較為複雜的形式在純食群體中區分出偏好流行樂和高雅音樂，也在雜食群體內部將偏好在地音樂和不一致的雜食劃出界線。不一致的雜食是五種音樂文化資本群體中文化資本多樣性最高者，其涉略各種音樂類型的廣度和深度都高於總體平均值。但它與Peterson等人提出的雜食有明顯差異，後者對於通俗文化僅是淺嚐，主要仍是偏好高雅文化。在過去的相關研究中並未見研究者指出本研究中所發現的這個不一致雜食群體及其獨特性。綜上，2007年的臺灣社會有不同於

Bourdieu發現法國社會的高雅和通俗之區辨，也與Peterson等人指出美國社會變遷過程出現的雜食現象不全然一致。但2007年的音樂文化資本圖像是否同樣出現在不同時期的臺灣社會？臺灣社會的文化資本變遷有無一個明確且特定的趨勢或發展方向？依據目前已有的研究發現還未能下定論，有待未來投入更多的研究分析和使用多筆跨時間點的調查資料來釐清。

## 二、社會流動脈絡下的行動者跨界和劃界社會實踐

臺灣社會的結構變遷十分明顯，產業轉型和教育擴充造成結構流動，尤以代間教育流動格外鮮明。代間教育流動的社會化經驗是否影響音樂文化資本的形塑，抑或童年時家庭背景的社會化脈絡更具影響力？本研究發現整體社會的雜食比例高於純食，也高於幾乎不消費的群體。而且，代間教育流動和音樂文化資本有緊密的關聯性，呈現的結果是行動者最主要的音樂文化資本受到家庭背景對音樂慣習養成的影響，教育流動經驗則是扮演添加跨越階層音樂文化資本能力的角色。由於家庭慣習的養成具有影響的優位性，所以可以觀察到上層低度流動者的主要音樂文化資本是純食高雅音樂，底層低度流動者是幾乎不消費，向上流動者為雜食且（較）偏好在地音樂。故向上流動者即使有跨界流動的經驗，仍難以掩飾對臺語流行歌曲、歌仔戲和布袋戲的喜好，其主要的音樂文化資本類型依然黏著在幼年時家庭背景所內化的音樂慣習，表現出對在地音樂有相對較深且廣的涉略。但同時，向上的教育流動經驗帶來的異質性社會化脈絡也讓向上流動者發展出複雜的跨界和劃界社會實踐行動，即一方面為了與底層低度流動者做出區辨，另一方面又要努力追趕或仿效上層低度流動者的生活風格，故聚合在向上流動者身上的音樂文化資本特質是具有跨越階級的「文化跨界」（cultural straddling）雜食性和對不同群體的文化資本劃界。這樣的雜食文化資本也是多種社會化脈絡的規範性期待之相互妥協結果（Lahire, 2008, 2011），意味著文化正當性（cultural legitimacy）和非正當性（illegitimacy）之間的文化價值界線變得模糊而不再難以跨越。故教育流動模式和最主要的音樂文化資本類型之關聯

性可以說明文化再製模型具有較佳的解釋力。

再進一步從次要的音樂文化資本也有不低的比例則可以進一步說明「初始家庭背景雖是形塑音樂文化資本的最主要社會化脈絡，但並非唯一的影響來源，社會流動過程中所添加的音樂文化資本成了秀異的關鍵」，故文化再製模型弱假設獲得支持。這意味文化再製的地位取得觀點較社會流動取徑更加適合用來解釋行動者的最主要音樂文化資本類型來源，也符合Merton（1968）、Marsh與Barber（1976）討論「異質性社會化」和「複雜角色集」的論點，即社會實踐行動是當事人面對不一致的規範性期待所展現出的具體機制。

向上流動者的跨界流動經驗轉化為「排拒」和「仿效」兩種主要的社會實踐行動，故展現出音樂文化資本的雜食特質。但上層低度流動者的代間教育變化幅度不大，不一致的雜食比例卻不低。如何理解上層低度流動者在音樂文化資本上的跨界實踐？本研究從「區辨仿效者」和「文化善意」（cultural goodwill）的角度來理解。上層者面對社會結構變遷後大量的向上流動者仿效其文化資本的挑戰愈趨鮮明。因此，上層低度流動者透過瞭解非上層的音樂文化（通俗／大眾文化）以掌握文化多樣性的方式來達到區辨的目的，即能辨識「文化再製的上層」和「仿效的向上流動者」之差異。而且，上層低度流動者對於通俗／大眾音樂文化的熟悉程度不僅有深度且有廣度。所以，本研究發現上層者的「不一致的雜食」是不同於向上流動者的「雜食且（較）偏好在地音樂」，後者對於高雅音樂（如西洋和古典音樂）僅是淺嚐即止，是謂有廣度而無深度。上層者對於通俗音樂展現文化善意的現象在先前相關研究中多有類似的發現。Van Eijck（2001）指出高教育者並不排斥通俗文化，甚至還喜歡其中的某些類型。Peterson等人（Peterson, 1992; Peterson & Kern, 1996; Peterson & Simkus, 1992）也發現高階層者的文化類型更具多樣性和跨階層性。所以，上層低度流動者和向上流動者的雜食音樂文化資本有著不同的社會實踐意義，前者是為了區辨仿效者和展現文化善意，後者則是排拒和仿效的結果。然而，遭遇「社會流動使得其（個人）

身處於交叉壓力之中」(Blau, 1994: 41)的向上流動者是如何藉由文化資本來處理社會情境中所面對的不自在感和情緒波動(Friedman, 2014)、格格不入的感受(Daenekindt & Roose, 2013b)，即如何以文化資本進行細膩的印象管理，以及用何種方式進行仿效和仿效的結果是否能夠融入或被接納，這些都是重要而待解的問題。此外，本研究結果是否適用於具有不同比例的結構流動和循環流動的社會，以及結構流動和循環流動的比例對於行動者的文化資本形塑有何種不同的影響，這些都值得未來做進一步的分析。

誌謝：本論文的研究經費來自科技部計畫經費支持(MOST 109-2410-H-259-002-MY2)，特此感謝。

## 附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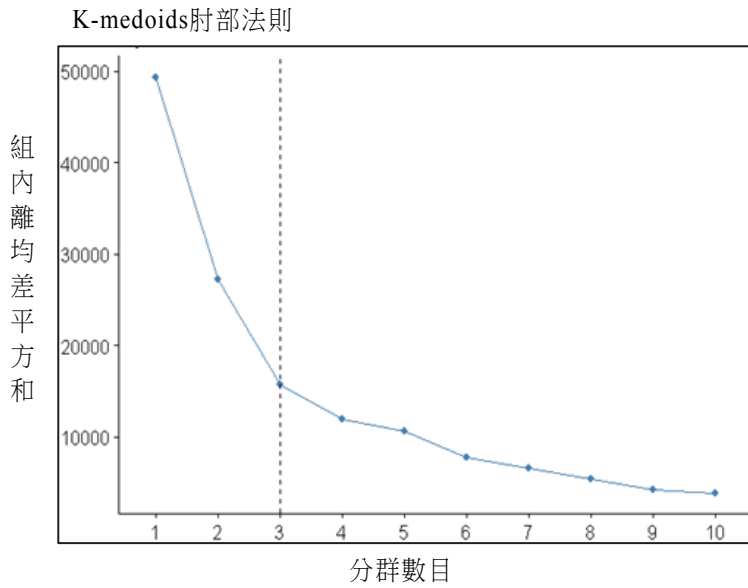
附表1 代間教育流動分群

群數	第 k 群	父親教育年數	子代教育年數	n (%)
2	1	12.5	14.8	366 (26.6)
	2	4.6	10.4	1008 (73.4)
3	1	12.5	14.8	366 (26.6)
	2	<b>5.7</b>	<b>11.8</b>	<b>790 (57.5)</b>
	3	0.5	5.4	218 (15.9)
4	1	12.5	14.8	366 (26.6)
	2	<b>6.0</b>	<b>8.0</b>	<b>202 (14.7)</b>
	3	<b>5.6</b>	<b>13.1</b>	<b>589 (42.9)</b>
	4	0.5	5.4	217 (15.8)
整體平均		6.7	11.6	1367

附表2 代間教育流動的各群組內變異加總

k 群	WSS	與 K-1 差異
1	49384	-
2	27285	22063
3	15749	11535
4	11940	3810
5	10613	1326
6	7740	2874
7	6587	1153
8	5466	1121
9	4272	1194
10	3845	427





附圖1 代間教育流動的肘部法則曲線

附表3 音樂文化資本的多類別邏輯迴歸

	幾乎不消費	純食流行	純食高雅	不一致
性別 (男 <sup>a</sup> )				
女	-0.256	-0.185	-0.002	0.121
年齡	0.032***	0.015	-0.046***	0.016
省籍 (閩南人 <sup>a</sup> )				
大陸各省市	0.112	-0.173	0.559	-0.212
客家人	0.098	0.075	0.210	-0.503
主觀認知社會地位分數	-0.165***	-0.051	0.027	0.031
代間教育流動 (上層低度流動 <sup>a</sup> )				
向上流動	-0.178	0.144	1.170***	0.670
底層底度流動	-0.012	0.186	2.228***	2.161***
收入 (千)	0.003	0.006	0.006***	0.008***
階級 (非技術工 <sup>a</sup> )				
專業階級	0.463	0.445	1.333***	1.252***
行政階級	0.317	0.387	0.663***	0.660
自營階級	-0.257	-0.030	0.071	-0.080
技術工	-0.391	-0.041	0.034	0.553
務農階級	0.667	-0.024	-0.494	-0.027
截距	-0.437	-0.175	-0.311	-2.569***
-2LL		3787.378		
Cox&Sneell		.316		
Nagelkerke		.330		
N		1374		

註：1. 依變項的對照組是「純食流行」；2.<sup>a</sup>為對照組；3. 表中所列數值為迴歸係數 (B)。

\*\*\* $p < .001$ .

附表4 音樂文化資本的多類別邏輯迴歸

	幾乎不消費	純食流行	純食高雅	雜食在地
性別 (男 <sup>a</sup> )				
女	-.377	-.121	-.123	-.306
年齡	.016	-.016	-.062***	-.001
省籍 (閩南人 <sup>a</sup> )				
大陸各省市	.323	.212	.811**	.038
客家人	.601	.503	.714*	.578
主觀認知社會地位分數	-.196**	-.031	-.005	-.082
代間教育流動 (上層低度流動 <sup>a</sup> )				
向上流動	1.326***	1.492***	.433*	1.449***
底層底度流動	2.173***	2.161***	-.067	1.975***
收入	.005	.008*	.002	.002
階級 (非技術工 <sup>a</sup> )				
專業階級	-.789	-1.252***	.080	-.807**
行政階級	-.343	-.660	.002	-.273
自營階級	-.177	.080	.151	.049
技術工	-.944*	-.553	-.518	-.594
務農階級	.694	.027	-.467	.002
截距	-.042	.408	2.324***	.419
-2LL			3787.378	
Cox&Sneell			.316	
Nagelkerke			.330	
McFadden			.120	
N			1374	

註：1. 依變項的對照組是「不一致的雜食」；2.<sup>a</sup>為對照組；3. 表中所列數值為迴歸係數 (B)。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朱元鴻（1997）。這雙腳所經驗的階層：審美判斷的初探。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彙刊，7（1），111-129。

[Chu, Y. -H. (1997). Social ladders measured by one's own feet: An analysis of aesthetic judg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7(1), 111-129.]

林宗弘（2009）。臺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92-2007。臺灣社會學刊，43，93-158。

[Lin, T.-H. (2009). Post-industrializing Taiwan: Changing 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inequality, 1992-2007.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3, 93-158.]

林宗弘（2013）。失落的年代：臺灣民眾階級認同與意識形態的變遷。人文與社會研究集刊，25（4），689-734。

[Lin, T.-H. (2013). The lost decade: Changing class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5(4), 689-734.]

林宗弘（2015）。臺灣階級不平等擴大的原因與後果。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5（2），45-68。

[Lin, T.-H. (2015).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reasing class inequality in Taiwan. *Taiwan Economic Forecast and Policy*, 45(2), 45-68.]

林宗弘、胡克威（2011）。愛恨ECFA：兩岸貿易與臺灣的階級政治。思與言，49（3），95-134。

[Lin, T.-H., & Hu, K.-W. (2011). Cross-strait trade and class politics in Taiwan.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49(3), 95-134.]

姜添輝（2001）。評論馬克思主義的普羅化論點及在教師專業與階級意識的意義。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2），33-57。

[Chiang, T.-H. (2001). Critique on Marxist proletarianization and its meanings

on teaching profession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2), 33-57.]

張宜君、林宗弘（2015）。臺灣的高等教育擴張與階級複製：混合效應維繫的不平等。《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5（2），85-129。

[Chang, Y.-C., & Lin, T.-H. (2015). How does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produce class inequality? The case of Taiwan.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5(2), 85-129.]

張芷雲、廖培珊（2008）。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書。臺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Chang, L.-Y., & Liao, P.-S. (2008).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2007, Phase 5, Wave 3*.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莊致嘉、游騰林（2016）。反省文化資本理論在臺灣的有效性：文化品味、較裕和階級的關聯性及其變遷。《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6（1），39-87。

[Chuang, C.-C., & Yu, T.-L. (2016). A Study of the validity of the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in Taiwan: Changes i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ultural tastes, education, and social class.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6(1), 39-87.]

陳寬政、劉正（2004）。臺灣的教育發展與教育流動：結構流動的分析。《人口學》，29，71-94。

[Chen, K.-J., & Liu, J. (2004).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mobility: An analysis of structural mobility in Taiw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29, 71-94.]

蔡淑鈴（2004）。高等教育的擴展對教育機會分配的影響。《台灣社會學》，7，47-88。doi:10.6676/TS.2004.7.47

[Tsai, S.-L. (2004). Effects of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on In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Taiwan Sociology*, 7, 47-88. doi:10.6676/TS.2004.7.47]

關秉寅、彭思錦、崔成秀（2019）。臺灣高教擴張對年輕世代薪資及職業的影響：反事實的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1（4），555-599。

[Kuan, P.-Y., Peng, S.-C., & Choi, S. (2019). Does a college degree still pay? A caus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ollege expansion on earning and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31(4), 555-599.]

蘇國賢、喻維欣（2007）。臺灣族群不平等的再探討：解釋本省／外省族群差異的縮減。臺灣社會學刊，39，1-63。

[Su, K.-H., & Yu, W.-H. (2007). When social reproduction fails: Explaining the decreasing ethnic gap in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9, 1-63.]

## (二)英文部分

Aschaffenburg, K., & Maas, I. (1997).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areer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4), 573-587. doi:10.2307/2657427

Bauman, Z. (1998).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Bauman, Z. (2001). *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 Oxford: Polity Press.

Blau, P. M. (1994). *Structural contexts of opportuniti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lau, P. M., & Duncan, O. D.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Bourdieu, P. (1994).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2000). *Pascalian meditation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yun, S., Schofer, E., & Kim, K. (2012). Revisit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East Asian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5(3), 219-239. doi:10.1177/0038040712447180
- Chan, T. W., & Goldthorpe, J. H. (2007).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Music in England.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1), 1-19. doi:10.1093/esr/jcl016
- Chan, T. W., & Goldthorpe, J. H. (2010). Introduction: Social status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In T. W. Chan (Ed.), *Social status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pp. 1-2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in, A. (2012). Gender and highbrow cultur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oetics*, 40, 423-443. doi:10.1016/j.poetic.2012.07.003
- Chuang, C.-C., & Lin, D.-S. (2017). Trajectory of cultural taste: 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lass mobility on cultural tast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62(3), 193-223. doi:10.6209/JORIES.2017.62(3).07
- Coulangeon, P. (2005).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musical tastes: Questioning the cultural legitimacy model.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46(5), 123-154. doi:10.3917/RFS.465.0123
- Daenekindt, S., & Roose, H. (2013a). A mise-en-scène of the shattered habitus: The effect of social mobility on aesthetic dispositions towards film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1), 48-59. doi:10.1093/ESR/JCR038
- Daenekindt, S., & Roose, H. (2013b). Cultural chameleons: Social mobility and cultural practices in 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 sphere. *Acta Sociologica*, 56(4), 309-324. doi:10.1177/0001699313496589
- DiMaggio, P. (1982).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2), 189-201. doi:10.2307/2094962

DiMaggio, P. (1987). Classification in ar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4), 440-455. doi:10.2307/2095290

DiMaggio, P., & Bryson, B. (2000).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cultural author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arts. In C. Blake (Ed.), *The arts of democracy: The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culture* (pp. 243-274). Princeton, NJ: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DiMaggio, P., & Mukhtar, T. (2004). Arts participation as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2-2002: Signs of decline?. *Poetics*, 32, 169-194. doi:10.1016/j.poetic.2004.02.005

DiMaggio, P., & Ostrower, F. (1990). Participation in the arts by Black and White Americans. *Social Forces*, 68(3), 753-778. doi:10.2307/2579352

Duncan, O. D. (1979). How destination depends on origin in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tab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4), 793-803. doi:10.1086/226861

Emmison, M. (2003). Social class and cultural mobility: Reconfiguring the cultural omnivore thesis. *Journal of Sociology*, 39(3), 211-230. doi:10.1177/00048690030393001

Erickson, B. H. (2008). What is good taste good for?.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28(2), 255-278. doi:10.1111/j.1755-618X.1991.tb00154.x

Erickson, R., & Goldthrope, J. H.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alk, M., & Katz-Gerro, T. (2016). Cultural participation in Europe: Can we identify common determinant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40(2), 127-162. doi:10.1007/s10824-015-9242-9

Friedman, S. (2014). The price of the ticket: Rethinking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 mobility. *Sociology*, 48(2), 352-368. doi:10.1177/0038038513490355
- Goldthorpe, J.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allmann, K., Artime, C. M., Breuer, C., Dallmeyer, S., & Metz, M. (2017). Leisure participation: Modelling the decision to engage in sports and culture.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41(4), 467-487. doi:10.1007/s10824-016-9275-8
- Han, J., Kamber, M., & Tung, A. K. H. (2001). Spatial clustering methods in data mining: A survey. In H. J. Miller & J. Han (Eds.), *Geographic 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pp. 33-50).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 Katz-Gerro, T., & Jaeger, M. M. (2013). Top of the pops, ascent of the omnivores, defeat of the couch potatoes: Cultural profiles in Denmark 1975-2004.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2), 243-260. doi:10.1093/esr/jcr058
- Kaufman, L., & Rousseeuw, P. J. (1990). *Finding groups in data: An introduction to cluster analysis*.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 Lahire, B. (2008). The individual and the mixing of genres: Cultural dissonance and self-distinction. *Poetics*, 36(2), 166-188. doi:10.1016/j.poetic. 2008. 02.001
- Lahire, B. (2011). *The plural actor*. Cambridge, UK: The Polity Press.
- Lamont, M. (1992). *Cultivating differences: Symbolic boundaries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hman, B., & Dumais, S. A. (2017). Feminization of arts participation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Gender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capital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t school. *Poetics*, 61, 26-38. doi:10.1016/j.poetic. 2016.12.003
- Lipset, S. M., & Bendix, R. (1959).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zardo, O., & Skiles, S. (2012). Reconceptualizing and theorizing omnivorousness: Genetic and relational mechanisms. *Sociological Theory*, 30(4), 263-282. doi:10.1177/0735275112466999

Lucas, S. R. (2001).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6), 1642-1690. doi:10.1086/321300

Maccoby, E. E. (2007). Historical overview of socializ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In J. E. Grusac & P. D. Hastings (Eds.),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pp. 13-41).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Marsh, R. M., & Barber, E. (1976).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In R. K. Merton (Ed.),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and other essays* (pp. 3-31). New York: Free Press.

Marsh, R. M., & Hsu, C. K. (1994). White-collar proletarianization? The case of Taiwan.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13, 43-69.

Merton, R.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Merton, R. K., & Barber, E. (1976).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In R. K. Merton (Ed.),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and other essays* (pp. 3-31). Free Press, New York, NY.

Mortimer, J., & Simmons, R. (1978). Adult social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 421-454. doi:10.1146/annurev.so.04.080178.002225

Peterson, R. A. (2005).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The example of omnivorousness. *Poetics*, 33(5), 257-282. doi:10.1016/j.poetic.2005.10.002

Peterson, R. A., & Kern, R. M. (1996). Changing highbrow taste: From snob to omnivo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900-907.

Peterson, R. A., & Simkus, A. (1992). How musical tastes mark occupational

- status groups. In M. Lamont & M. Fournier (Eds.), *Cultivating Differences: Symbolic Boundaries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 (pp. 152-186).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entfrow, P. J., & Gosling, S. D. (2003). The do re mi's of everyday life: The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correlates of music prefer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6), 1236-1256. doi:10.1037/0022-3514.84.6.1236
- Schmutz, V., Stearns, E., & Glennie, E. J. (2016). Cultural capital formation in adolescence: High schools and the gender gap in arts activity participation. *Poetics*, *57*, 27-39. doi:10.1016/j.poetic.2016.04.003
- Shavit, Y., Arum, R., & Gamoran, A. (2007). More inclusion than diversion: Expansion, differentiation, and market struc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In Y. Shavit, R. Arum, A. Gamoran, & G. Menahem (Eds.), *Stratif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pp. 1-3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rokin, P. A. (1972 ). *Social mobi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 Van Eijck, K. (2000). Richard A. Peterson and 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Poetics*, *28*(2), 207-224. doi:10.1016/S0304-422X(00)00022-X
- Van Eijck, K. (2001).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musical taste patterns. *Social Forces*, *79*(3), 1163-1184. doi:10.1353/sof.2001.0017
- Warde, A., Martens, L., & Olsen, W. (1999). Consumption and the problem of variety: Cultural omnivorousness, social distinction and dining out. *Sociology*, *33*(1), 105-127. doi:10.1177/S0038038599000061

